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问”

迟福林

【编者的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堪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础。随着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课题,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那么,如何判断经济转型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性?如何以稳定制度预期为重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以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结构性矛盾?……围绕上述“三问”,我们约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此进行解答。



一问 如何判断经济转型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新阶段,经济结构变革的趋势性特点比较突出,经济结构还有较大调整空间,这将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重要机遇。

其一,产业结构变革趋势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产业结构升级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前提。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社会结构才会随之发生变化。产业结构转型将引发人们工作方式的变化,形成新的现代职业结构。“十三五”时期,我国的产业结构正从工业主导服务业主导转型,服务经济的创

新发展正在引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将可能达到58%左右;到2030年可能达到70%左右。产业结构升级将深刻改变就业结构与提升就业收入。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就业占比将有可能从2015年的42%提升到50%左右。产业结构的转型有利于白领劳动群体的大量涌现,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发展空间。

其二,消费结构变革趋势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当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升级

型”特点相当突出,并成为推动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的内在动力。估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将有可能从当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将催生新供给、新产业、新业态,还带来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比如2016年上半年,教育、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行业用工需求均同比增长。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明显超过传统服务行业。可以预期,消费结构升级及制造业服务化的快速发展,将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

新的空间。

其三,城乡结构变革趋势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从现实情况看,中等收入者很大一部分来自城镇,未来,促进广大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是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有效途径。目前,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并且加快转型的新阶段,估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每年提高1至1.2个百分点,到2020年可能达到60%左右。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其就业形态将日趋多元化,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未来几年,如果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引导、落实优惠举措、相关改革取得突破,一部分农民和农民工就有希望成为扩围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力军。

总的看,经济转型升级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重大机遇。从社会关注的焦点看,要把这个机遇转变成现实,关键是要稳定制度预期。一方面,城乡居民的财富存量不断增长,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有所扩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如果财产权处理不好,将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的波动性增大,并由此拉大贫富差距。

第一,扭转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当前,股票和房产已经成为相当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财富载体。近几年,金融和房地产领域“脱实向虚”倾向较为突出,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和实体经济融资困难,也增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不稳定性。振兴实体



二问 如何以稳定制度预期为重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经济,实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既是经济运行中的重大挑战,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大任务。

第二,增加农民财产收益,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客观讲,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最大空间在农村。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当务之急是在严格农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限制的前提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落实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益物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收益。

第三,提升产权保护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预期。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当前,产权制度改革要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步推进,比如,尽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创

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创新劳动力产权制度,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尽快实行规范的员工持股,让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员工能够凭借自身的技术、管理以及劳动力产权获得财产性收入,并形成企业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知识产权资本化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可以说,完善的法治化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扩大、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保障。



三问 如何以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结构性矛盾?

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性变化蕴藏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潜力。问题在于,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总的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以城乡结构、教育结构和税收结构变革为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破解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加快城乡结构变革,在城乡一体化中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再分配制度,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增强公共政策的普惠性,让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

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精准扶贫等政策更好惠及广大农民工。另一方面,还要激发社会组织个性化、低成本的优势,增加服务供给。

二是加快教育结构变革,在提升人力资本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教育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因素所在。当前的突出矛盾是:一方面,每年有700多万大学毕业生,其中一部分面临就业难、学非所用的突出问题。2016年本科生毕业所找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关度较低。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急需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严重短缺。日本产业队伍中的高级技工占比达到40%,德国达到50%,而我国仅为5%

左右。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需要通过教育结构改革和教育市场开放,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教育体制,形成全社会办教育的社会环境,形成与经济转型升级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结构。由此,使具有创新意识、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有条件进入中高收入群体。

三是加快税收结构变革,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税制。合理的税收结构能够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并且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需要逐步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提高

直接税比重。此外,扩大以财产税为重点的直接税征收范围和征收力度,有利于降低工薪阶层税负。

总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它对推动结构性改革释放转型新动力、对破解世界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焦虑”、对推进引领经济全球化都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一个坚实的制度底座,也需要一个开阔的上升空间。无论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还是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都给中等收入群体开启了前所未有的良机。遍观世界,我们的执政党保持着“让人民更幸福”的初心,我们的人民保持着勤劳肯干的本色,只要坚持以“提低、扩中、限高”为主题的制度创新,橄榄形社会可期可成。(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从供求两端推动农民工消费升级

华中炜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新形势下,下大力气调动消费的潜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高质量服务,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扩大消费形成较强发展动力的重点内容。其中需要尤为注意的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释放农民工的消费需求,既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点,也是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着力破解农民工消费的约束条件,促进广大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经济依靠消费拉动特征愈加明显。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从长周期的角度观察,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收入和人口结构两大因素。从收入方面看,当前我国的人均GDP逐年增长,已经超过5万元人民币,接近了国际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同时还叠加了代际变迁、收入分配收敛迹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等

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的有利因素。从人口结构角度观察,每一个国家的人口史各自诠释了消费的高潮跌宕,如今风向转至中国。国际调查发现,大部分家庭在父母46岁时达到支出高峰,从而导致一国人人口峰值在46岁区间时往往伴随着一个消费支出的峰值点,如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初和80年代末的两次消费浪潮、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消费峰值。如果以人口峰值在46岁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消费支出的峰值点,中国有望在2015至2025年迎来“46岁”消费高峰。

在消费平稳增长的同时,消费升级的浪潮正在发生,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服务型、品质型消费市场发展良好。一季度,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同比增长17.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个百分点;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4.8%,加快7.4个百分点;汽车类商品中SUV一季度销量增长15.1%,明显高于普通轿车增速。旅游娱乐休闲消费增长较快,国家旅游局报告显示,一季度居民整体出游意愿为82.0%,同比环比均有上升。

从全球经验观察来看,中国正在上演的消费结构升级的浪潮将会持续。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相当水平,接近国际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商品的消费支出已走过快速增长的阶段,居民消费结构正从房子汽车的时代向服务消费转变,与闲暇相关的服务、娱乐、体

验式消费刚刚起步,正如这几年“跑步热”兴起,正是收入与闲暇结合的典型代表,美国城市人群的跑步时尚热潮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

二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能转换,农民工群体在需求端和要素供给侧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之前,农民工群体主要作为要素供给主体而存在,农民工带来的廉价劳动力是其核心竞争优势。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农民工群体的成本优势正在消退,经济也已经更多转向内需,尤其是消费驱动,重新认识农民工群体在消费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很有意义。

一方面,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在迎来他们生命周期的消费高峰。《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长1.5%;农民工平均年龄已从2013年的35.5岁、2014年的38.3岁、2015年的38.6岁上升到2016年的39岁。根据当前的年龄分布来推算,未来这一庞大群体的平均年龄将继续老化,这样的年龄结构在客观上存在不断增加消费支出的诉求。根据前述人口结构与消费的规律,我国

农民工群体正迎来一个消费需求的高峰。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引领农民工群体的全新消费潮流,消费升级的倾向更为明显。《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从零点咨询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上来看,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基本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类似,其中食品类支出以及休闲娱乐支出占比都较高。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作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和开放式的新思维,消费观念也和老一代有着巨大的差异,价廉不再是主要的选择标准,更加注重物美和品牌化。

此外,近年来农民工的加速回流和本地化显著提升了这一群体的消费率,并正成为中小城镇和农村消费升级的重要推手。随着我国产业区域布局的调整,农民工的迁移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本地务工。2011至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趋势。在新的迁移模式下,原先消费市场与就业市场的隔离得以统一,非消费类支出大幅降低,这对于本地农民工家

庭的消费有着显著的提振作用。我们的定量分析发现,本地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率显著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外地务工农民工家庭。在自身消费率提升的同时,农民工的回流和本地化也通过消费观念的直接传播和人口聚集的间接推动,推动中小城镇和农村消费升级。近年来,电商等新兴消费业态在中小城镇的增速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小城镇巨大的消费潜力。

三

虽然农民工已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生力军,但现有的制度约束对其消费潜力的制约不容忽视,未来收入缺乏保障、看病难、养老难等等,依旧是限制农民工消费潜力的主要痛点,一些地方存在的就业歧视又进一步约束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针对这些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重视农民工既是消费升级主体又是要素供给主体的重要地位,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推动农民工消费升级,为当前的消费浪潮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有生力量。

一是继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破除约束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藩篱。应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要抓手,通过合理分担市民化成本等方式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加快完善城镇职工社保和医疗对农民工群体的覆盖面。二是强化农民工群体的收入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既要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工资收入,还要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化社保网络的兜底能力。此外,还要采取措施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和技能训练的力度,为持续提升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奠定基础。三是注重建设返乡农民工的良好消费环境。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流通网络;积极探索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为返乡农民工建立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本版编辑 欧阳优